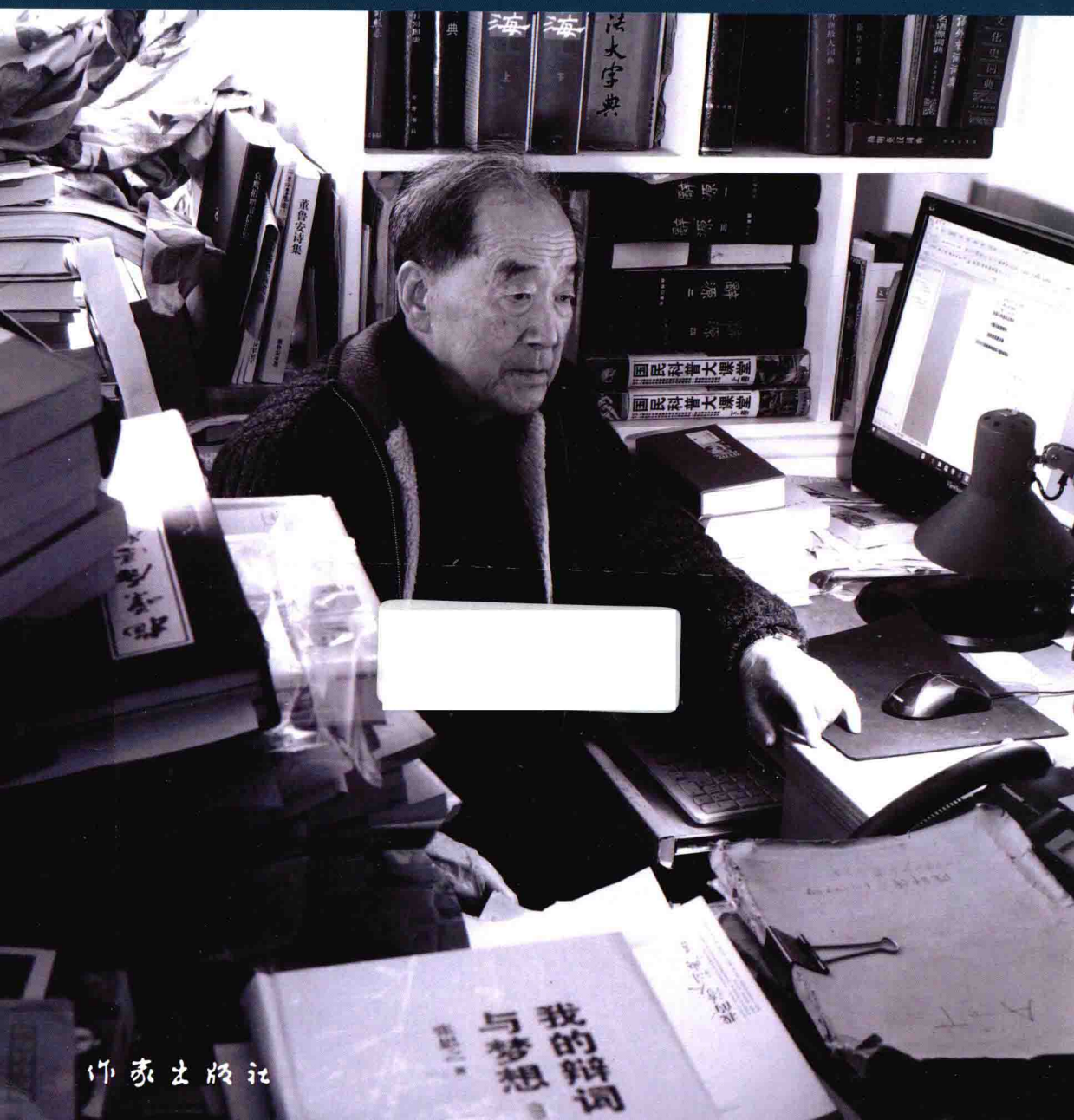


邵燕祥 著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作家出版社

我的辩词
与梦想

邵燕祥 著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死过, 我幸存, 我作证 / 邵燕祥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063-8849-8

I. ①我… II. ①邵… III. ①邵燕祥 - 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5822 号

我死过, 我幸存, 我作证

作 者: 邵燕祥

责任编辑: 窦海军

装帧设计: 梅 彬

封面摄影: 窦海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27.7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49-8

定 价: 5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陀斯妥耶夫斯基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毕竟经过死亡，你是幸存者。

——卡夫卡

作者的话

谨以此书，献给在这块多灾多难的热土上与我同命运者及其亲属，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献给曾在苦难中，以爱和信任支持我、鼓励我活下去、站起来的亲人和朋友；

也献给所有跟我一起走过那非正常年代，同辈的以及上下一两代遭际相似的过来人。

我知道，其中千百万人已经不在，他们没有能够活到今天。

历经忧患的生还者也都逐渐老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写出来，献给健在者和一切敢于直面历史的同时代人，只有他们有权利来审查这一份历史的见证。

有别于权力持有者和财富拥有者，我一生的各个阶段都处在社会、群体的边缘，但我作为亿万中国人之一，几千万中共追随者之一，成百上千万读书人之一，通过自己的途径参与过当代的社会生活，在没有完全剥夺政治权利的时段，也或深或浅地卷入了进步或倒退的历史潮流。

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在这个长达二十多年的过程中，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我编写了《沉船》《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长编性的实录；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以当年的文字化石为依托的，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叙述，既是我的心灵史，又是我的忏悔录。这也为我写此书作了准备——使我在这次书写中，得以宕开笔来，把个人的经历只作为一个线索，而着重陈述我对这一段历史的再认识。

这是我这“一个人”眼中的历史，因此详略和侧重不同于历史课本及大事记；我力求真实和理性，但限于个人的视角和视野，也不能替代宏观的史论。请大家如实地把它当作一个小人物走过一个大时代的亲历来看。

人类的历史，在东方这片土地上走了一个大弯路。这个大弯路中，又套着许多曲折的“之”字，每一次拐弯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像斯大林说的被甩出车外，也许索性是被推出车外，或死或伤。我只是那千百万人中的一个罢了。而即使一直坐在车里的人，也都付出了时间——也就是生命的代价。

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在长达几十年的大弯路上，多次错失了振兴的机遇，对其他国家、民族尤其是一些周边地区也造成过负面的影响。

我们这几代人，该怎样向我们的后人交代呢？

走过大弯路，若按“拨乱反正”的说法，是回到出发的原点；但就是一心走回头路、想要重走老路的人，也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了。

然则在“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怎样走上一条新路，一条正路，一条全人类共同的阳光大道？这不是空想的乌托邦，而是面前的问题，脚下的问题。

接受血泪浸透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理性地说“是”或者说“不”吧。

2007年2月27日灯下

2016年2月21日改定

目 录

一九四五·一九四六

沦陷区成了所谓收复区	3
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6
鲜血使对国民党的失望化为仇恨	9
诗人和战士：闻一多在我心中	10
我所了解和不了解的延安	15

一九四七

真诚的向往和虚构的歌颂	19
投身政治斗争：浪漫主义多于现实主义	21
唱着歌走向“五·二〇”运动	25
一切取决于站在哪个政权哪个党派的立场	27
加入民主青年联盟是我的“成年礼”	32
许多年后确认自己的无知	35

一九四八

“五一”口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40
在组织生活中接受党的政策方针和斗争哲学的教育	44
中国的灾难通常都以日期命名	48
多事之秋，快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	54
诗和文学不再是现实以外的栖居	59

一九四九

一阵狂欢，列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65
华北大学：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	72
“我是初来的”：青春记忆又掀开新的一章	81
我成了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	89

一九五〇

用笔跟踪进军的步伐，跟踪“武器的批判”	99
改造为战士，才有掌握“批判的武器”的资格	106

一九五一

“三大运动”：首先是“仇美、反美、蔑美”的宣传	114
全社会的“镇压反革命”和机关内的“忠诚老实学习”	118
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126

一九五二

一站一站地走向土地改革第一线	134
白茨滩乡的土改顺利完成	140
重点中的重点：划“阶级成分”和分“胜利果实”	145
“三反”“五反”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展开	152

一九五三

历史舞台上的暗转：又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157
在哀悼斯大林声中，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63
跑龙套：对幕后戏全不知情更不参与的小角色	167

一九五四

工业建设的背景寄托了我的诗情	173
不满足于只写工业和建设	180
咏叹已逝的历史时，不期当下也成为历史	187

一九五五

大张旗鼓地违反刚刚制订的第一部宪法	193
从文学到政治，大兴文字狱由此开局	199
从革命到反革命，“只在人情反复间”	204
对“二梁”的公开批判为批“二胡”让路	206
高岗其人和他的案件扑朔迷离	210
业务工作也离不开政治	215
不相信谢文秀是“暗藏的反革命”	218
狂热地投向“社会主义高潮”	226

一九五六

大历史和小人物一起面对新的里程	232
我走进文艺界这个“是非之地”	235
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的逐步“解冻”	240
伟大的斯大林也会“犯错误”吗？	247
“百花齐放”放出了“干预生活”之花	250
是耶非耶，法捷耶夫以一死还了良心债？	257
懵懵懂懂进入了全世界的多事之秋	260
一切是缘于鲁迅所说的“隔膜”	266
种种“未完”，自将在 1957 年延续	274

一九五七

“毛选”第五卷是了解 1957 年的钥匙	278
毛泽东说 1956 年是多事之秋	281
1957 年 1 月，毛泽东说还是多事之秋	285
我只想有个家，安顿纸笔也安顿心灵	287
毛泽东估计敌情严重，要变被动为主动	289
整风可以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	294
毛泽东走在所有人的前面	304
郭小川的文章当时曾经让我失望	307

文学动态纳入了毛的大文章	311
敏感时期的苏联之行	314
山雨欲来：从“鸣放”到反右	320
假批判和真批判真假难分	329
批判与被批判、审查与受审查中的人际关系	336
“相信群众相信党”使精神就范	342
把民主党派驱出政坛十年不晚	348

一九五八

开除党籍，以及关于“政治生命”的思考	353
十三陵工地上的劳动第一课	362
过了“生活关”和“劳动关”以后	367
置身全国“大跃进”热潮的边缘	375
又一场阶级斗争和 285 张大字报	381
霜风凄紧中走向黄骅的劳改农场	405

附录

碎片（谢文秀）	409
---------------	-----

一位老诗人回忆他的“那时”：

像初出马厩的小马
第一次望见平原——

像初出鸟笼的小鸟
第一次望见天空——

他的“那时”是五四运动后一段年月。

我迟生了二三十年，我的“那时”是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

我生于1933年6月。我生于忧患。

我出生之前，1931年“九·一八”日本军队突袭沈阳北大营，随后占领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日本军队向上海发起进攻，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炸毁；1933年1月，山海关落入日军之手；同年5月，日军沿长城攻陷中国军队阵地，占据了密云、怀柔，威胁北平，即将长驱直入，在华北大地上耀武扬威。

似乎遥远的北方近邻，在北半球拥有最辽阔疆土的苏联，已经强制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把成百万的农民和许多少数民族赶出家园，流徙异乡，对抗者遭到肉体折磨或消灭。共产国际指示德国共产党以社会民主党为最危险的敌人，致使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堂而皇之地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原先慕尼黑酒吧里的捣乱者要在整个欧洲逞凶了。

1933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杨铨（杏佛）遭暗杀，鲁迅明知自己也已列入黑名单，还是毅然前往杨杏佛的追悼会，随身没有带家门的钥匙。他的挽诗留下了“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句子，使我们知道当时连苍天也垂泪了。

就在这个多事的1933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的行营召开了南方五省

“剿匪军事会议”，而中央苏区的共产党还正进行激烈的内部斗争，同时在所谓“查田运动”中乱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闹得农村里惶恐不安。

这就是我生逢的乱世。但我呱呱落地时自然一无所知。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小小生灵，在风雨飘摇的国运之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个人命运，有多少必然，又有多少偶然，简直谁也无法逆料。

几十年后回首往事，才发现冥冥中似有一种决定人们命运的力量，中国版图以内，以至整个地球上千丝万缕枝蔓纠葛此起彼落互为消长的各种政治力量，都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千百万普通人的离合聚散饥饱穷通，直到生或是死！

我生在北京。这个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在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仍是北洋政府的首都，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天无二日”，地无两京，北京改称北平。我是在古城改名北平期间出生的。但在我四周岁那一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建立伪政权，虽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却颁布了“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国歌”（《卿云歌》），俨然如伪满洲国又成一“国”，旋改北平为北京，也是要成为一“国”京都的意思吧。后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了标榜“和平，反共，建国”的伪国民政府，表面上统管了所有沦陷区，北京云云也就只有故都旧京之义了。

我小学六年全在日本占领下度过。所受的是奴化教育，首先倒不在于增加了日本教官和日语课，而是从历史教科书里删去了由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的记录，删去了一切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删去了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等字样包括蒋介石的名字。涉及历史——更不用说涉及抗日和民族解放、涉及对压迫者的反抗的书刊都遭查禁销毁。我们沦陷区的青少年，依靠亲友师长私下的教导，社会传闻，还有劫余书刊字里行间的消息，了解世界形势、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一些事象，确认我们是在忍气吞声当亡国奴。偷听《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一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老的小的，真是“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啊。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也“惨胜”了。此后，我们头上就总高悬着鲁迅尖锐的提问：“做外国人的奴隶不好，做本国人的奴隶就好么？”

一九四五·一九四六

沦陷区成了所谓收复区

小时家里有一堆 20 世纪之初的出版物，不但有民国初年，还有清末光绪年间印行的。早期铅印只有句读没有新式标点，新闻纸已泛黄的；线装楷书石印密密麻麻的；通俗文言的，半文半白的，小说、时论，都是宣传维新的……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总要冒出多种多样的声音。

日本占领的后期，为了加紧控制舆论，也由于战时纸张严重匮乏，北京各家报纸合并成一种对开四版的《华北新报》，所有各种期刊合并成一种用骑马钉装订不套色的《中华周报》。

1945 年“八·一五”后，最迟到 9 月间，在北平（这时北京又敏感地复称北平了），可以买到平津两地的许多日报，街上叫卖的报贩都喊出花儿来。我记得听说天津出了一种以鲁迅标名的报纸，但没看到过，好像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这些如雨后春笋的报刊，背景不明，但总归打破了万民缄默的郁闷，基调是欢呼抗战的胜利。重庆当局还只派来“先遣人员”，头号先遣官落地不久，就传出跟一位年轻风流的京剧坤角名伶的绯闻（那时候叫桃色新闻），我们是从小报的社会新闻版证实的。

接着，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各路接收大员的后续队伍络绎来到。正是唐诗人张籍所云：“战后几人归故土，惟有官家重做主！”他们在没收敌伪公产和私产（汉奸的私产叫作逆产）过程中中饱私囊，大捞特捞，人们概括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他们的接收也就被称为“劫收”。在这前后，还钻出一批所谓“地下工作者”，有的并没从事过抗日

的地下工作，只是通过一定关系同重庆方面挂上了钩，得到授权，或者压根儿就是冒充，一样的扬长过市，招摇撞骗。

我当时写了一个小品剧本，题名《流线型》，意即流行人物，题词“伊人天外飞来，此君地下钻出”，就是指的这种现象。借用（也许谈不上借用，只是在一个低层次上笨拙地摹仿）“故事新编”的手法，写阿Q冒牌的把戏在咸亨酒店被人戳穿。这是1945年秋，我刚刚进了汇文中学读初一，见教学主楼安德堂前壁报连片，我一个人办起一份《五十年代》，请高中国文教师李戏鱼题写了隶书刊名；壁报由四张16开纸拼成，毛笔抄写，这个小品剧本占了一块版。其他三版的文字也是我独家经营，因为没保存下来，内容已经忘记，总之不是文艺形式，多半是时评、杂感一类。

这份壁报只出了创刊号。因为给《奔流》壁报投稿，那编者是高中的马宗汉，他约我帮他编文艺版；第二年，即1946开春我又参加了陈秉智、赵嗣良、张乃圣、李新民等组织的自由读书会，有壁报《自由周刊》，我自己就不再出壁报了。

汇文中学，壁报和壁报后面的课外社团十分活跃，在北平的中学里是突出的。后来甚至被称为中学里的“民主堡垒”。

汇文和慕贞，育英和贝满，崇实和崇慈，都是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相邻，原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将它们改归市立，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恢复原名。

这些学校本来就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汇文初创于1871年，当时称汇文学校，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现在一些历史专题片里，少不了从有限的老电影胶片中翻出的一个镜头：五四运动时一支学生游行队伍打着汇文的横标。段祺瑞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里，汇文有唐耀昆、谢勘两同学遇难（唐耀昆是六十年后一度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唐达成的叔父），校园里一直矗着纪念他们的方尖碑，日本占领时期，校方在碑上涂抹了一层灰泥盖住碑文，才保存了下来。

太平洋战争以前的老校长高凤山又回来了，他是留美学生，教育思想开明，汇文有比较浓厚的民主空气，跟他的学养作风分不开。我当时完全不懂政治，尤其于政治的组织层面更是不甚了了。我如饥似渴地要读课外书，读原先不曾见的新书，参加自由读书会，却不知创办者之一的陈秉智那时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且还是支部书记。我只把他们看作同样热爱文学、同样

关心国事的高年级大同学。他们告诫我要警惕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学生，我才多少感觉到事情——或叫斗争的复杂和严重。

战争和灾难的动荡年代使人早熟，锻炼人应付社会生活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变化多端的政局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则使人政治上早熟，使人增长善观察、知进退、团结多数以打击敌对力量的政治智慧。我那些地下党的兄长们属于这一代，当时他们不过十七八岁顶多二十挂零，领导汇文等校的北平地下党中学学委李营（化名老丁）也不过二十多岁。有人说我也算是早熟，不对，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情绪化的，只是依凭朴素的正义感，作直觉的判断，跟着我信任的人走，在许多问题上几乎没有逻辑的过程。

在国民党抑或共产党、蒋介石抑或毛泽东之间作出选择，对每一个 20 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而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在 1945 年秋冬在同学中间毫不避讳对毛泽东的好感：“毛泽东的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蒋介石写得出来么？”

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不免要组织青少年的游行，以壮声势。日本统治时期，我因为在小学，没有躬逢其盛。抗战胜利后，我头一次参加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前欢迎美军，我很乐意参加，跟卡车上笑容满面、红光满面的大个子美国兵互相挑起大拇指喊：“顶好！”又一次叫我们列队上天安门前，在西边三座门那儿迎来一辆检阅车，何应钦——就是 1935 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者、现任军政部长沉着脸站在车上，像泥塑木雕，让人失望。最后一次，又驱赶我们到太和殿前空场上，说“欢迎蒋主席莅临”，场面大，我在后面“矮子观场”，扰扰攘攘，不但什么都没听清，也没看见蒋介石的尊容，就一身尘土疲乏地回家了。不久以后，天安门上挂起一幅大半身的蒋介石戎装像，领章勋章绶带佩刀一应俱全，通体的凜然寒气，仿佛在向路人示威。

而我那时已经见过毛泽东的肖像，从解放区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封面上，从油印的《论联合政府》封面上，都看到单线平涂的铅笔素描毛泽东头像，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和蔼，略带愁容。那是蒋介石的咄咄逼人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果说只是一阕词的文采、两张面像的比较，就决定了我的爱憎，那又显得过于简单了。

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参加过中国革命的法国文化名人马尔罗说，中共和毛泽东的胜利是宣传的胜利。我第一次读到中共的宣传小册子，是从我高中毕业班的哥哥燕平手里神秘地接过来的陈伯达著《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揭露了蒋介石独夫治国的真面目：一党专政，“人莫予毒”，从头到脚是慈禧太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衣钵传承；说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当时对沦陷区人民来说，长期视为正统中央政权代表的蒋介石，还笼着一道合法性光环，不是几句“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歌谣所能动摇的。读了陈伯达这本书，再不想去看他所批判的蒋的原著；在“雪夜关门读禁书”似的愉悦中，有领会了一种“独得之秘”的自豪，也有跟每个少年都潜在的叛逆心理相应的颠覆权威的快感。后来又读到陈伯达写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很佩服他的眼光和笔力。完全没想到他是我后来发现的那样一个，时时揣摩“圣意”，希意承旨，卑怯畏葸的“笔杆子”。

当然，比陈伯达的书更具权威性的，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那是转过年来1946年初寒假前，国文老师仇焕香借给我看的油印本。他大概是听了我放言无忌地蔑蒋崇毛，也放心地告诉我他有“那边的朋友”。我小时候既是羞涩内向的，有时却又爱表现。加上当时重庆正在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与会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社会贤达”，都在大讲和平民主，和平民主是政治上的旗帜，也是民间的话题；我没有组织上的约束，没有政治上的顾虑，只代表我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免不了现趂现卖。而和平民主的确符合我内心的要求。

连年的战祸，“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我没有直接的经验，但不乏间接的见闻。我父亲的老家，浙江萧山下邵村的祖屋，日本兵一把火给烧成废墟；伯父一家成了流落的难民。叔父只身在大后方参加抗战，而他最小一个女儿，在家乡久病不治，临终前眼巴巴想喝一碗糖水的小小愿望也没法满足，就那么无告地去了。那是我只有两三岁的堂妹啊。外来侵略者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结束了，像人们在长夜漫漫的八年中想望的“天亮了”，难道中国人不该在晴朗的蓝天下过和平的日子么？难道不该组成一个新的全面代

表中国人利益和意志的联合政府，取代“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蒋家天下么？

《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建设一个和平的民主的自由的一个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纲领，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美好蓝图。而把孙中山所说“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之”的国家政权视为一己禁脔的蒋介石，就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在政协会上提出“军队国家化”，就是要把共产党手里的八路军、新四军收编；共产党在会上针锋相对提出前提条件是“政治民主化”，就是说，成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你手里的国军或称中央军不再是国民党一党的党军了，那么八路军、新四军也就实现“国家化”。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而且认为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军队应该为国干城，以防御外敌、保卫国土主权为惟一神圣职责，而不应介入政治斗争，成为一党一派的工具。那时候没有读到更多的毛泽东著作，不懂得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支部建在连上”到“党指挥枪”的一整套建军理论，更没有预见到，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谁若讲“军队国家化”，就无异于主张军队脱离党的领导，是阴谋削弱以至篡夺党的军权，是反革命。

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连家门和学校门外的社会生活还不曾涉足，哪里有实际政治经验？即使读过几本野史演义，也只把其中争权夺柄杀伐惨烈当作遥远的故事，哪会联想到自己置身的现实中，同样会变幻着权术、策略和种种光怪陆离的手段？

那时候认定国民党蒋介石不肯“还政于民”，反对联合政府，却不曾想过，即使在某种条件下，例如迫于美苏等国际压力一时组成了联合政府，也必然是短命的；暂时互不情愿地妥协，不久也会闹摩擦而分裂。试想，国民党独占权力近二十年，独吞的肥肉再吐出来，自然绝不甘心；共产党和毛泽东，世俗地说，都不是“久居人下”者，不会满足于“分一杯羹”的政治地位。引经据典地说，“我们争的是人民的兵权，是党的兵权，不是个人的兵权”，准此，在为党和人民争取执政权的份额上也必然会是理直气壮的。进一步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以人民的以至人类的解放为己任，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从人民的联合政权到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逻辑的必然，而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专政是“不与别人分享的阶级统治”（列宁）。——后来从1949年新政协后，建立有中共以外的接受中共领导的党